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二次房改難在「地方積極性」



隨着地價、房價的新一轮飆升，政府部門和開發商的相互推諉加劇，現行住房制度的弊端顯露無疑，「二次房改」的呼聲也隨之而起。14位房地產界專家學者不久前聯名上書國土資源部及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建議進行二次房改，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解決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

總體上看，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讓低收入家庭受益，商品房則主要面向高收入群體，這一制度設計本身就使佔城市人口六成的中等收入家庭落入夾心層。特別是近幾年房價一再瘋漲以後，中等收入家庭既不符合購租福利性住房的條件，也買不起商品房。在這樣的背景下，「二次房改」應運而生，甚至在一定範圍內成爲了一種主流聲音。

有利中等收入家庭

可是，我卻對所謂的「二次房改」充滿了擔憂，這倒不是說「二次房改」的建議不好，而是說正是因爲這個建議太好了，太有利於中等收入家庭了，才難以執行下去。據悉，「二次房改」就是針對中等收入家庭，提出了「四定兩競公共住房」的概念，即非營利公益性建房機構和建築開發商以「定地價、定建房標準、定稅費率、定5%利潤率，競房價、競建設方案，綜合打分高者得」方式招標供地建設的準市場化平價住房，供應對象主要是佔城鎮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

不難發現，所謂的「二次房改」，其實就是在現有的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改良版，比如經濟適用房對房價、地價、建房標準、稅率和建造方案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四定兩競公共住房」也是如此，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限價房，類似於糧食收購的保護價。唯一的區別在於，經濟適用房不能進入市場交易，而「四定兩競公共住房」可以進行交易，除此之外，還真找不到兩者的關鍵區別在哪裡。

既然「四定兩競公共住房」和經濟適用房大同小異，那麼，兩者的處境也一定差不到哪裡去。

政府積極性並不高

目前，在國內的大多數城市，特別是中等收入城市，經濟適用房已經逐漸失去了吸引力，甚至用「要死不活」來形容經濟適用房的處境也不爲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此前披露的數據也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新開工經濟適用房3388萬平方米、48萬套，僅僅約佔全年指標的37%。爲何經濟適用房建設進展緩慢？多位房地產內專家均表示，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是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對建經濟適用房的積極性不高，導致無法形成規模效應。衆所周知，相比建造商品房，經濟適用房簡直就是個虧本買賣，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開發商，都無法從中獲得可觀的利潤。再聯想到「二次房改」所提出的「四定兩競公共住房」，同樣是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碗中的羹，後者所遭遇的境況可想而知，絕不會比經濟適用房好到哪裡去。

徐光木

美以輪胎問題轉移視線

章玉貴

假如區區幾十億美元輪胎事件的國際影響被傳媒放大，也許正中美國的下懷。如今，中國希望發展中國家在IMF和世界銀行中擁有50%的投票權，可謂有理有利有節，讓美國很難進行正面回應。於是，美國希望通過發動貿易挑釁，以達到部分削弱國際社會對改革金融秩序關注的目的。



美國主動挑起對華貿易爭端，儘管看起來並非明智之舉，某種意義上卻是轉移國際社會關於改革金融體系視線的戰術動作。自由貿易本來就是假命題，美國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失去貿易領袖地位，卻很難容忍別國對其金融主權地位的挑戰。不過，金融版圖變天的日子終究會到來。

白宮決定並不愚蠢

中國政府雙管齊下高調反制美國對華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動，可能令登上國際舞台不久的奧巴馬政府有點意外。有評論說白宮在G20匹茲堡峰會召開前夕貿然對中國輪胎實行懲罰性制裁，實爲愚蠢決定。而從國內外的反應來看，美國政府似乎在此事件上很難得高分。不過筆者認爲，放在當前國際經濟與金融大環境中觀察，白宮的此番決定可能一點也不愚蠢。

首先，從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美中作爲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三的貿易大國，去年雙邊貿易額高達3337億美元。相對成熟而穩定的貿易關係不大可能被只佔對美出口總額0.4%的輪胎貿易摩擦所破壞。也許，中國會付出10萬產業工人失業的代價，但是美國深知，中國可以拿出的報復籌碼遠不止汽車產品和雞肉這些。何況中國已經可以做到熟練運用法律手段解決雙邊貿易糾紛。因此，雙方的爭吵分貝可能很大，但不大可能演變成全面貿易戰。雙方最終會以彼此均能接受的體面方式解決輪胎特補事件。

其次，假如區區幾十億美元輪胎事件的國際影響被傳媒放大，也許正中美國的下懷。因爲，在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國際社會關於改革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呼聲越來越高令美國人關心。中國已經提出對IMF投票權「對半分」，主張匹茲堡峰會「應將焦點放在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IMF)投票權」。這比華盛頓和倫敦峰會時中國的主張更明確，更具體。而IMF作爲美國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符號，自成立以來一直被美國所控制。如今，中國希望發展中國家在IMF和世界銀行中擁有50%的投票權，可謂有理有利有節，讓美國很難進行正面回應。於是，美國希望通過發動貿易挑釁，以達到部分削弱國際社會對改革金融秩序關注的目的。

也許，這才是白宮決定對華出手的真實意圖。從中美輪胎貿易結構的互補性來看，美國本不應拿中國輪胎出口開刀。按照媒體的猜測，奧巴馬動用421條款主要出於鞏固藍領工人和工會對其支持的考慮。奧巴馬也知道，假如這次玩大了，弄不好會惹出大麻煩。因爲大規模貿易戰的惡果早有前車之鑒。例如，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了《斯穆特—霍利法案》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關稅，結果世界各國相繼跟隨美國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兩年內全球貿易量萎縮了三分之二，從而加劇了全球經濟的大蕭條。而今，在世界經濟與復蘇進行時間賽跑的關鍵時刻，奧巴馬卻祭出貿易保護主義大旗，除了前面分析的原因之外，也是自由貿易讓位於國家利益的一次小規模博奕。

自由貿易是假命題

正如徹底的市場經濟是假命題一樣，自由貿易同樣不是什麼真命題，只是停留在教科書上的人類理想。歷史上看，無論是英國還是後來的美國，均把自由貿易作爲經濟擴張乃至經濟掠奪的漂亮藉口。即便是在世界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的今天，建立在WTO框架下的全球貿易體系也是以國家利益或區域利益爲重的。美歐和美日之間都會爆發過貿易衝突，中國和主要貿易夥伴國之間也是摩擦不斷。所有這些，都是由於全球分工深化、產業結構轉移而導致的利益流轉局部失衡的結果。世界可以在自由貿易的旗號下爲各國商品之間的交易提供更爲便利的條件，以節約交易成本，提升人類福祉，但當基於市場配置的利益流轉影響到國家利益時，所謂的自由貿易完全可以被暫時拋在一邊。

只是美國應該認識到，在既有金融體系已經無法反應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今天，美國的局部動作或許可以拖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步伐，但無法改變這個趨勢。先得承認，

中國由於缺少可以撬動國際金融大變革的槓桿，使得中國在提出相關的建設性主張時往往有心無力。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更是如此。

金融版圖遲早變天

但是，當全世界都承認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全球經濟失衡時，作爲求解全球經濟失衡關鍵步驟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早就應當不以美國意志爲轉移地到來。除非美國敢於發動戰爭來轉移視線。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肯定會在加強區域金融合作的同時，理直氣壯地提出並實現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主張，打破只有美國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系統健康和穩定的迷思，進而拿出關於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機制設計範式。真正從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出發，構造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尤其是在至關重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方面。

中國追求的目標應該是：重新審核基金份額，在設計份額和投票權及其分配的過程中，擴大基礎投票權，使之既反映已有經濟規模的總量指標，又要前瞻性地考慮能夠反映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指標，從而保證制度設計的前瞻性和動態的公正性，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及相應的話語權；廢止美國事實上的否定權，特別是要約束美國濫發美元的行爲；並加大對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督和預警，以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表示，要「通過評估等級、年檢、誠信記錄和兩個效益的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聞出版企業單位，做到生死由業績和市場決定。

通過市場的方法淘汰長期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報社、刊社、出版社，解決「優不勝劣不汰」而造成的出版資源難於集中的問題」。目前報刊退出機制正在試點中，將在不久後在全國推開，報刊業將形成競爭有序、有進入許可、有退出標準的一個良性環境。目前，《中華新報》則成爲第一家倒閉的中央級新聞報紙。

求得市場化生存

在西方國家，報刊的生生滅滅，根本就不算上新聞。譬如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已有《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時報》等6家主流報紙出版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即使是老字號的《讀者文摘》，不久前也提出了破產保護的申請。在中國，雖然媒體都已經適應了市場化生存，但在身份上卻難以融入市場。

因爲，中國媒體，無論廣播系統還是報刊雜誌，都屬於耳目喉舌，發揮着引導輿論的宣傳效應。傳統上，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屬於事業人員，而事業編制和公務員一樣，拿的都是終身的鐵飯碗。近年來，雖然媒體改革和轉制一直進行，但媒體身份定位至多是實現了部分的企業化，形成了事業、企業編制並存的狀態。而這，成爲媒體市場化生存的掣肘。媒體人員身份不能實現從事業到企業的轉制，媒體企業化的目標就是一句空話，也就會出現該倒閉和破產的媒體僵而不死的尷尬，結果是養了一大堆閒人，耗費了大量財力和人力資源，更消磨了媒體競爭的意志，拖垮了其他媒體。因爲在廣告市場整個的大盤內，多一家不死不活的媒體，廣告價格就會被壓得很低，造成一家不景氣全部媒體跟着倒臺現象。

《中華新報》倒閉，具有典型的破局意義。中央級新聞媒體倒閉，預示着掛靠（主辦）單位不再是其「背靠乘涼」的「大樹」，也切斷了其依附母體的利益臍帶，消弭了其耽於幻想的事業身份，促其完全徹底地企業化，靠博奕市場去求生存。既然沒有來自市場的戰略資本支持，倒閉是必然的結局。對《中華新報》而言，倒閉而死固然是悲劇，但這種市場化的「死」，在某種程度上卻充滿了殉道先驅的悲壯色彩，促使其其他媒體進行從苟延殘喘的依附性生存到市場化生存的蝶變。

更深遠的意義在於，既然中央級新聞報紙都可以倒閉，省、市（縣）級媒體又有什麼理由不轉換身份，求得市場化生存呢？

魯迅先生說得好：「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消亡。」中國媒體改革，行進有年，但累積的矛盾焦點和瓶頸所在，就是無法實現由事業到企業的真正完全的轉制，導致媒體負重爬坡，成本壓力難以承受。尤其中央級媒體，人員身份問題尤難解決，導致了人員身份事業、企業混雜，相同人員有不同待遇的不公平現象，導致媒體競爭力降低，媒體內部矛盾重重的窘相。很多這樣的媒體，徒具中央級、省市級媒體的虛名，早就缺失了大眾傳播媒體的大眾知名度。

實現企業化轉制

傳統媒體面臨市場化蝶變

張敬偉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完全市場化操作的新銳媒體，在市場上縱橫馳騁，期望通過資本重組，超越區域樊籬，併購其他地方媒體，做大做強媒體規模。但遭遇到的最大難點也在於，完全市場化、企業化的報刊只能收購同類型的報刊，哪怕殘存一絲事業基因的媒體都無法實現市場化對接。就此而言，媒體不實現企業化的轉制，中國就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報刊或媒體集團。作爲文化產品的重要載體，也預示着中國的文化產品缺乏世界級的競爭力，成爲中國軟實力的短板。

須知，像《讀者文摘》那樣完全秉承市場化操作，擁有48個版本，19種語言，風行60多個國家，擁有1.3億讀者的暢銷雜誌，也會在市場中翻船，更遑論處於事業化和企業化「三文治夾層」中的中國媒體了。對中國媒體而言，企業化轉制和市場化生存只是第一步，還面臨着更爲艱難的數字化生存壓力。《中華新報》的倒閉，不啻是一計猛烈的棒喝，不惟調所有媒體警醒，也警示文化和創業產業，必須「斷腕」，另闢市場化生存路徑，同時主動融入數字化的博奕洪流中。值得一提的是，事業單位改革已拉弓上箭，這爲中國媒體改革也提供了助力。



9月22日晚，福建漳浦縣在天福茶博物院舉行曲水流觴宴。曲水流觴源於古代文人流行飲酒或飲茶賦詩的一種雅事。

限招博士生

何勇

今秋起，暨南大學將全面推行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其中明確限制導師招生人數，原則上博士生導師每年招生不得超過一名，導師多招生要爲學生「買單」，文經管類博士生每超過一名，導師需一次性上交配套經費1萬元；理工醫類博士生每超過一名，導師需一次性上交配套經費3萬元。

筆者認爲，導師多招博士生需交納配套經費的做法，實質目的是爲了擴招博士生，是爲了鼓勵導師多招博士生，是爲了學校和導師斂財提供一個看上去又與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的藉口和理由。

首先，如果學校真的是爲了保證學生質量，禁止導師多招博士生，採取的措施其實很簡單，就是嚴格規定每一位導師只能帶一名博士生，對於導師多招的博士生，學校不錄取，甚至可以對多招博士生的導師實行開除處罰措施。這無疑才是遏止導師擴招博士生的最有效和最好措施。

其次，當前導師多帶、多招博士生，主要目的是讓這些多招的博士生爲自己幹活，爲自己的公司、項目打工。即使多招一名博士生需要向學校支付1萬元或3萬元配套經費，但是相比較多招的博士生爲自己賺取的利潤來說，是少之又少。

再次，當前少數人爲了讀博是不惜一切代價。前段時間就發生了某女研究生賄賂70歲教授的醜聞。現在規定導師交錢就可多帶博士生，無疑是將博士生招生權下放給導師。這樣導師多招博士生需要交納的配套經費最終還是由多招的博士生自己承擔。

最後，交納博士生配套經費的限招措施，最大獲利者是學校本身。一方面表面上實行限招政策，爲自己賺取名譽，並且把出現問題的責任和自己撇清；另一方面對多招的博士生，不僅能多收學費，而且能收配套經費，實質就是學校爲參與導師爭取的科研項目分紅尋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陳菊「台獨」本性難移

李羽



民進黨有幾個女立委，論吵架，詞鋒犀利、口舌便給、炮火猛烈、聲勢驚人；論打架，搥耳光、扯頭髮、擲文件、美人拳、擦臉蛋，也可以說是「巾幗不讓鬚眉」，稱得上是「女中豪傑」。倘在「梁山泊」時代，她們肯定是有資格在「忠義堂」上佔一座位的。相比之下，國民黨的女將就顯得文質彬彬，甚至有些弱不禁風了。因是之故，台灣「立法院」上演「全武行」時，不論男兵女將，不論如何扭作一團，吃虧的最終似乎大多數是國民黨一方。

「台獨」實幹家

雖然如此，但若論實力、權謀、奸巧，以至陰毒，在民進黨女將之中，現任高雄市長陳菊才是一等的頂尖級人物。客觀地說一句，連黨主席有了「暴力小英」之稱的蔡英文，恐怕也比陳菊稍遜一籌。蔡英文本是民進黨中的「清流」，平時的形象溫文爾雅，從未見殺氣騰騰，在黨內談不上什麼派系，自然也沒有什麼「子弟兵」。以台灣的大男人主義，恐怕也沒有男人肯做女人的「子弟兵」，做「觀音兵」則另作別論。

陳菊與蔡英文相比，可說是另一種模式的民進黨人。首先，在國民黨主政之下，陳菊是民進黨在政府中職位最高的公職人員，即高雄市長，而且是民選市長。高雄在台灣憲制中是「直轄市」，目前只是台北、高雄有此級別。陳菊作爲現任黨內最高級別的公職人員及民選的「直轄市」首長，其在民進黨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那是不難想見的。舉例說，陳菊「登陸」，不但蔡英文點頭，黨內也未見有人反對或有什麼「閒言碎語」；其後，台南市長許添財想「有樣學樣」，對不起，黨內的有形無形

壓力就一波接一波，最終令許市長因「待遇」不同而意興闌珊，就此作罷不「登陸」。其次，在「台獨」問題上，陳菊雖未提出過什麼「理論」，但她是「實幹家」，她以重大的行動顯示她在推動和實踐「台獨」理念方面的份量。這一點，她不像蔡英文，而更像陳水扁。阿扁有很多「去中國化」的行動，例如郵政「正名」，例如「終統」，將「四不一沒有」中的「沒有」沒有掉了，例如提出「制憲新台灣、正名新國家」等等。陳菊也是「行動派」，她最近有兩大重要行動，在兩岸關係中掀起了驚濤駭浪。

玩「三獨合流」

第一，在「八八水災」後，以陳菊爲首，聯同南部其他六名民進黨籍縣市長，邀請達賴喇嘛訪台「爲災民祈福」。此事不但給馬英九出了個大難題，更嚴重影響兩岸關係，損害了一年多來兩岸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面。結果，達賴所到之處，都有台灣民眾示威抗議，「達賴滾回去」的呼聲響徹寶島。最令民眾不齒者，陳菊等人敢做不敢認，說是達賴想來他們才邀請，企圖將一切推在達賴頭上，但達賴辦公室立即發表聲明，說收到邀請才有台灣之行。

第二，作爲高雄市的主政者，陳菊決定在高雄播放美化民族分裂分子熱比婭的紀錄片。熱比婭是烏魯木齊「七·五」嚴重打砸搶燒殺（包括活活打死人）事件的幕後策劃人，早已確定爲「三股勢力」的頭子。陳菊最初堅持要在高雄電影館播放美化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其後在各方壓力下改爲提前數天播放。由陳菊對「藏獨」、「疆獨」的竭力支持，不難看出她的「台獨」立場已達何等程度。陳菊主政高雄，結果高雄就成了「三獨合流」之地。毫無疑問，陳菊在這「三獨」同流合污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無論台灣民眾或大陸人民，這筆賬肯定是不會忘記的。歷史就是如此。

需重新「定性」

陳菊「登陸」後，各方的反應都是正面的。陳菊本人也公開表示，民進黨「應因應時勢改變（對大陸的）態度」云云，令人以爲她在「台獨」問題上的立場將會作出調整。不料，這不過是陳菊的「虛晃一槍」而已，也就是騙人的假動作，讓人想起當年批判李登輝的評語「假統真獨」、「虛統實獨」等等。而且，陳菊根本上不談「統」、只行「獨」，即使沒有公然宣揚「台灣獨立」，實質上陳菊至少是不折不扣的「隱獨」分子或「緩獨」分子。在「達賴事件」和「熱比婭事件」之後，若相信北京必然會對陳菊重新加以「定性」。陳菊若再想訪問大陸，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就算能去，接待規格也未必會那麼高了。陳菊的特立「獨」行，對她本人是政治損失，高雄市民和高雄人民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害己害人莫此爲甚。

陳菊其實是一個老牌的「台獨」分子。一九八六年，她已是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的成員之一。換言之，她也是創黨元老。陳菊現時的地位和實力，恐怕不在「四大天王」之下。當然，一個人的理念是會變的，但陳菊會否放棄「台獨」理念，而且不再再有「台獨」行動，那就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了。在現階段，只能說陳菊「台獨」本性難移。

作者爲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